

拜伦想象的中国与中国人想象的拜伦

——从灾难史的角度切入

顾 瑶

1821年10月至1822年5月，拜伦在意大利比萨等地活动，他把日常琐思收集在《静默遐想》(*Detached Thoughts*)的小册子里，共计有一百二十篇。在第五十一篇中有这样一番对历史年代的表述：“人类念念不忘强调某个非凡的时代，尤其喜欢选择诸如‘革命’、‘瘟疫’、‘入侵’、‘战争’、甚至‘彗星出现’这些日期来划定年代。这种以灾难为标志的编年方法司空见惯，比如‘大干旱’、‘泰晤士河的干涸’、‘七年战争爆发’……‘里斯本地震’、‘利马地震’、‘伦敦瘟疫’等等”。拜伦转而问道，“为什么不用和平、丰收甚至夏日晴好来做年代的记录，就像如果有三十或七十年战争，为什么不说三十或七十年和平呢？”就在他猜想是否有哪怕一天的寰宇和平时，不经意间想起了中国，“或许除了中国，不喜欢穷兵黩武，静止的中庸之道，（使他）欢足而穷困。”¹的确，中国式的纪年都是吉祥的，丰足的，和平的，如汉之“龙兴”、唐之“长庆”、宋之“元丰”、明之“永乐”，清之“康熙”，看来拜伦的说法也不无道理。我对这段话的兴趣源于两方面的因素。第一，它体现了一种“灾难”式的历史想象叙事；第二，它包含了对中国的一种“他者”想象叙事。但更为重要的是，在全球史观的视阈当中，我们可以在这两点中挖掘出异质历史的融合与碰撞的潜流。

首先，需要将“历史观”从个人的层面，做一个合理的界定。历史观是个体对历史的认识，一般可以依据个人所知和亲身体验，提出诸如此类的问题：历史的发展是否有一个脉络，是否有一个中心，历史应得到怎样的表述。拜伦在1821年对欧洲历史的反思倒是同当代“环境史学”的某些观点相吻合。不过在

¹ Byron, George Gordon. *Byron's Letters and Journals*, Leslie A. Marchand ed. London: John Murray Ltd, 1979. Vol. 9, 29-30.

十九世纪的格局下，这种表述其实体现了一种救赎式的基督教历史观。依照基督的教义，人类的历史是救赎的历史，整个人类的历史都是围绕神对罪人的拯救展开的。上帝选择降临灾难，警告惩罚作恶的人类。就像没有无休止的厮杀与争斗，没有人类无以复加的暴力和罪恶，就不会有大洪水的来袭，没有因贪婪而起的祸端，就不会有战争，饥荒和地震。人类似乎只有在灾难的炼狱中忍耐，才能得到救赎，最后得到神的成全。这也许是西式纪年不必灾难罪孽的原因。

但是拜伦在这则手札中表达了对这种历史叙事的怀疑和些微的不满。如果灾难是历史的分页符，上帝看不见的手势，那些美好的日子将归于何处？他突然想到了中国，这似乎是个异数。有趣的是，拜伦的喟叹倒能在中国历史的传统记述中得到部分的印证。纵观中国历史，治世和乱世交替更迭，前者如文景之治，光武中兴，贞观之治、开元盛世，康乾盛世。后者又如吴楚七国之乱、八王之乱、侯景之乱、安史之乱……乃至于绵亘于二十世纪的百年动荡。

自从政治和思想上的大一统局面在汉武帝时代确立以来，中国历史就呈现为不断返回起点的圆周轨迹。在“信而好古”儒家传统驱动下，历朝各代都希冀恢复远古的“五帝三王”盛世²，这种根深蒂固的复古情结演化成一个神秘的文化象征，促成了众多封建王朝的宿命。

故而，若将拜伦写下那段话的时刻设定成一个支点，那么它同时存在于两个形态中。一个是基督教救赎式的历史观，另一个呈现为宿命式的努力返回原点的循环。这两种历史观在中古时代分割着欧亚大陆的时空领域，除了零散的商贸文化交流，并没有产生剧烈碰撞，直到现代性国家的衍生和拓展，才打破了时空的平衡。正是在不同历史板块的摩擦碰撞中，现代性历史上的一道全球文化景观诞生了。这就是拜伦作为历史角色及其诗性想象中的图景。

长久以来，拜伦研究或者英国浪漫主义研究中存在着一道很深的鸿沟，即拜伦在其母国英伦的接受同他在欧陆和东亚截然不同。我们似乎习惯了这种差异的存在，却未意识到这本身就构成一个问题，当然更不能提出信服的解释。本文拟选取两个历史的支点，在历史板块的互动中，考察中英拜伦观的不同，剖析其背后的成因。这一做法同“散点历史研究”³方法有表层的相似，却更多受到“文化诗学”方法论上的启迪。这样易于从经典叙事的裂缝和碎片中求得新意，

² “是以地无四方，民无异国，四时充美，鬼神降福，此五帝三王之所以无敌也。”李斯《谏逐客书》

³ “散点历史研究”的具体个案可见王德威的文章《1905、1955、2005——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三个时间点》，该文以英文发表在台湾《清华大学学报》上。（转录自黄云霞的‘微观历史中的现代性资源’）。

因为任何宏大的历史图景或者疆域总是由无数的细枝末节构成。作为国际文化景观的拜伦在中国和英国呈现出不同的接受，其中传递着一种现代性的国家历史观。

支点一：1821年的欧洲

1821年拜伦开始写《静默遐想》的小册子，这一年他流亡欧洲大陆已经六个年头，革命引发的流血和动荡还在蔓延，欧陆局势风雨飘摇。1819年8月英国发生了彼得卢大屠杀，1820年西班牙和葡萄牙爆发革命，1821年意大利人酝酿着针对奥地利人的暴动，希腊革命也爆发了，目标直指土耳其人的占领。处于历史现场的拜伦不知是否会用“民族性国家解放运动”来描述这个时代，但是他注定踩在两个时代的分割线上：一边是启蒙式世界主义理想渐行渐远，另一边国家主权思想逐渐成为时代主流。1821年5月5日，拿破仑在流放的海岛上去世，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终结。他一生的文治武功客观上巩固了各国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地位，但是对于欧洲邻国的征讨，永远打碎了启蒙运动培育起来的世界主义的理想。

在题为《英伦以外的世界》的文章中，克里斯廷·达利（Kirsten Daly）认为：“在法国大革命的过程中，英法两国内部的舆论充满了民族主义的火药味儿，此后世界主义的主张变得疑窦丛生，难以得到正面宣扬。法国走上领土扩张的道路，先是在1795年吞并了低地国家，接着占领瑞典，此刻的世界主义理想变得更加臭名昭著”。⁴“面对这样复杂的新局面，浪漫主义作家们起先是恐惧，再是抗争，最终发展出各自独特的言说方式。”⁵

拜伦更有着与众不同的言说方式。在他短暂的一生中，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在国外的游历中度过，成年后更是如此，他的个性如同他的人生一样飘忽不定。跨国游历（The Grand Tour）是一个欧洲贵族，抑或富裕阶层子弟教育相当重要的一部分，体现了“世界公民”的理想。世界主义的理想代表了欧洲贵族阶层共同的价值观，他们也借此维护自身专属的文化身份。可是中产和下层社会的艺术家和知识分子则歌颂肯定本土文化的习俗传统，对贵族们一切以“法国风

^{4,5} Daly, Kirsten. 'Worlds Beyond England: Don Juan and the Legacy of Enlightenment Cosmopolitanism' *Romanticism*; 1998, Vol. 4 Issue 2, p189-90.

貌”为马首是瞻加以猛攻。但拜伦并非依凭其贵族身份，就自主地接受法国文化。他对伏尔泰、卢梭的兴趣和钦敬，同斯达尔夫人的交往，以及对英国本土文化不加掩饰的鄙视都有直接的社会对象，这就是被马修·阿诺德（Matthew Arnold）称为“非利士人”阶层，一个正在慢慢崛起的阶层，即英国国内富有的中产阶级。阿诺德认为拜伦不同于其他贵族成员，“英国中产阶级的伪善让他恶心。他所在阶层虽然也质疑这种伪善，却遵从之，放任之，并学会从中渔利，对此他更为反感。”这种全民式的伪善被称为非利士主义。当时的英伦，正如阿诺德所描述的那样：“贵族世界拜金而麻木不仁，中产阶级愚蠢且面目可憎，下层社会粗俗而残暴”⁶。正是在这样双重的文化语境里，拜伦的文化立场才具有积极防御和对抗的意义。但是，面对法国入侵的威胁，英国国内局面愈发紧张，托利党（Tory）的统治更是杜绝了世界主义的言论空间和渠道。在这种气氛下，英伦愈发同欧陆疏离开来，拜伦愈发同母国疏离开来。在法国大革命的震荡中，在各种社会力量的博弈中，代表中产阶级政治诉求的民族主义渐渐成为历史的主流，但是发端于启蒙运动的世界主义理想却渐行渐远，慢慢淡出历史的地平线。而拜伦却孤傲地保持着他特有的贵族气质，保有着尼采推崇的贵族品格（Morality of the Noble）——独立和勇敢的心。在尼采看来，那就是对英国中产阶级的蔑视。

在 1821 年的天空下，那本微不足道的“静默遐想”（*Detached Thoughts*）获得了多层的涵义。在国家层面，英国率领“神圣同盟”结束了拿破仑的时代后，同欧陆渐次疏远。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如华兹华斯、穆勒等人目送着世界主义理想的火焰慢慢熄灭，极为勉强地“退到了民族性改良这条狭窄却安全的道路上来”⁷，他们不得不对新兴资产阶级的价值观表示认同，作出妥协，以逃入自然的方式掩饰对这个时代的反感，回避不可调和的矛盾，同时还要从人性的角度流出几滴无奈的眼泪，如此这般讨好着这个国家和人民。但拜伦是没有退路的，他同这个转型中的国家和人民格格不入，他的乖张行为为狭隘的英国民族主义的道德规范所不容，除了委身异国，参加一些激进革命运动，干他所轻视的文字营生，他别无选择，这是时代对其贵族气质的放逐。

⁶ Rutherford, A., ed. *Byron: the Critical Heritage*. London: Routledge & K. Paul, 1970. p455-56.

⁷ Newman, Gerald. *The Rise of English Nationalism: a Cultural History, 1740-1830*.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7. P.244.

或许只有在《唐璜》的叙事部分，可以看出他贵族气质的真实流露。苍白的主人公游走在欧亚大陆，一次次越界（border-crossing），在想象的跨国游历中扮演不同的角色。这是一种贵族性的想象，弥漫着对世界主义生存方式的依恋。而在杂议部分，拜伦以其超人的智慧，表达对科技分裂的质疑，对蓝袜子女士们的调侃，毫不犹疑地挖苦湖畔诗人狭隘的乡土意识。这些国内生活的鲜活场景让我们有理由相信《唐璜》包含了对英国狭隘民族性的批判。由于日益局促的生活空间压得人喘不过气来，诗人只能在虚拟的世界里，带上唐璜的面具，幻想着异性的追逐和抚爱，扮演着源于中世纪的公共角色，重温世界主义的理想。或许只有细心的读者才能体味出内心那份无以安放的苍凉。离开母国的贵族诗人越发孤独了，曾经自诩是诗界拿破仑的雄狮也愈发孤芳自赏。他慢慢步入壮年，还在寻找自己的位置，一个骑士应有的位置，却只能凭借写作捕捉一点时代的光影，暂时推开孤独与寂寞。总之，拜伦的自我放逐，体现了他对狭隘民族主义的疏离和对抗。

同样的道理，英国浪漫主义文学史上关于华兹华斯和拜伦的争论，也可以放在日益上升的英国民族主义同慢慢消亡的启蒙式世界主义理想的文化语境中来看待。华兹华斯的《序曲》虽然起初无人问津，却慢慢演化成体现英国民族性的史诗经典，而拜伦的《唐璜》即使以现在的标准，也能赢得畅销书排行榜的头筹但它始终处在学术争议的漩涡中。其中的原因是耐人寻味的。《序曲》彰显的田园诗学得到了英国国家意志的支持，上升为民族性的经典。它以美学的中立方式规定着“英国性”的本土品质，比如对质朴田园生活的向往，对“真诚”（sincerity）⁸的赞美，并流露出些许的英国式偏执。可是身处政治地理双重边缘的拜伦对英国道德、伦理、文化、社会方方面面的嘲讽，直刺中产们伪善的本质这可以视为一个姿势，一个世界公民对狭隘本土性和民族自满的反攻。这样的姿态，让英国文学经典的制定者们为难了，他们不愿将拜伦放入教科书的书目内。因为，《唐璜》的现实性处处在质疑所谓“英国浪漫主义经典叙事”的合法性，他的存在顿时让所谓“浪漫主义神秘的逃遁”变得疑窦丛生。其实正是这种神秘的伪装下，英国民族主义血腥的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被完美地包裹起来。总之，以新兴工商阶级为历史载体的民族主义决定了华氏和拜伦日后在英国国内的命运。拜伦虽然被狭隘的民族性国家所驱逐，却有幸成功抵御了来自自己国家和民

⁸ 英国人自诩的民族品格是真诚，所以这不是一般的词汇。

族的历史暴力，其写作彰显的自由和内在的人性解放，成就了他的世界声誉，并赢得了中国人的尊重。这始于1902年。

支点二：1902年之后的中国

1902年，拜伦的《哀希腊》三个诗节出现在梁启超先生的新小说《新中国未来记》中，这是拜伦作品首次出现在中国人的视野中。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流亡日本，他极有可能是在1902年前后通过日本的典籍对拜伦有了一定的了解。在《新中国未来记》中，他安排一个少年中国的主人公朗诵《哀希腊》的诗行，这位从未谋面的异邦诗人的诗句，像是春风一样抚慰了中国人苦痛的灵魂，唤醒了沉沦的大地。

1840年以来的无数次丧权辱国的痛苦，迫使中国人打量陌生的西方。故国遭受的凌辱，一次次革新无果而终，迫使尚有良知的清醒的中国人在绝望和奋斗中翘起前行。西方社会形态发展的轨迹和各种理论让他们觉察到一种新的历史观一种新的世界秩序，也许可以帮助中国人跳出朝代更迭循环的恶运。他们因此而狂喜。这种“狂喜”通过“哀希腊”的译介，通过小说《新中国未来记》、政论文《新民说》、《新史学》传递出来，构成了梁启超争取民族解放的“国家主义宣言书。”⁹他在这些著述中强调国民性，强调“群”的精神，强调自由和平等的观念。虽然，将这些现代理念有效地普及到民众当中，尚待时日，但是中国人，尤其是年青人对拜伦的尊崇却越发炽烈，拜伦热从此衍生开来。

其实，在今天看来，梁启超对拜伦，甚至对“哀希腊”多半是一种误读，或者说是一种创造性的阐释，当然这也属于合理误读。他有意遮盖了拜伦绝对自由的精神，将拜伦在希腊独立战争中的牺牲精神同希腊的民族主义联系起来，打造出一个争取忠于民族忠于国家的英雄，却无暇顾及诗人同母国的关系。他在《新中国未来记》中将一个想象中的理想公民同拜伦放在一起，却不知道拜伦远非那样有责任感。他开始制造另一种神话，一厢情愿地打造一个中国人喜欢的偶像，一个能在中国民族解放运动中鼓舞士气的英雄。后来，虽然像苏曼殊和鲁迅

⁹ 余杰，‘狂飙中的拜伦之歌：以梁启超、苏曼殊、鲁迅为中心探讨清末民初文人的拜伦观’《鲁迅研究月刊》1999年9月。

都挖掘过拜伦的其它特质，但是拜伦同中国民族主义的关联再也没有解开过。

1924年，《小说月报》在拜伦去世一百周年之际，推出专号“诗人拜伦的百年祭”，很多文化名人如郑振铎、沈雁冰、王统照、徐志摩还有赵景深都有撰文，而此时拜伦的诗作也有了诸多的译本和不断增加的读者群。中国进步知识分子对拜伦的兴趣，如今看来是理所当然的，无非是出于民族复仇，出于对弱小民族的同情，但是从更深层次看，拜伦所追求的自由和解放体现了一种历史的必然性。在1902年及以后数十年中，这种历史必然赋予中国人的是打破朝代循环的命运，“千年如一日”的圆周终于要打破了，梁启超在这一年中的著述是在为未来的共和岁月做理论和思想上的准备。中国要学会一种新的身份来同未来世界打交道，他其实同大多数国家一样被拖进了一种貌似进步的直线型发展轨道。可是在他的选择在获得合法性承认之前，还要经历一段相当漫长的灾难史。

伯纳德·罗素在《西方哲学史》中给了拜伦整整一章的篇幅，至今还让很多英国的文学研究者心怀不满。“拜伦发生影响的地方是在欧洲大陆，寻找他的精神苗裔也不要到英国寻找……但是在外国，他的情感方式和他的人生观经过了传播、发扬和变质，广泛流行，以至于成为重大事件的因素。”¹⁰这些苗裔包括德国的尼采与海涅，俄国的普希金，匈牙利的裴多菲，意大利的马志尼（Giuseppe Mazzini）等诗人式的革命英雄和才俊，看来中国人对拜伦的想象和推崇并非是孤立的现象。英国文学史对拜伦的冷淡是一种明显的学术不公，其中的原因可以从国家意识形态等命题中加以探究，我们希望这种不公能在国际的拜伦研究中得到正视和纠正。

¹⁰ 罗素《西方哲学史》何兆武，李约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76。P. 601.